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
ZHEJIANGYISHUZHUYEXUEYUANYISHUYANJIUCONGSHU

○主编 林国
何志

高铮○著

近代上海娱乐文化探微

ZHEJIANGYISHUZHUYEXUEYUANYISHUYANJIUCONGSHU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
ZHEJIANGYISHUZHUYEXUEYUANYISHUYANJIUCONGSHU

◎主编 林国荣
何志云

高铮◎著

近代上海娱乐文化探微

ZHEJIANGYISHUZHUYEXUEYUANYISHUYANJIUCONGSHU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娱乐文化探微 / 高铮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5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1-9/ 林国荣, 何志云主编)

ISBN 978-7-5059-5556-1

I. 近… II. 高… III. 文娱活动—研究—中国—民国

IV. G2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075 号

书 名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 (1-9)
主 编	林国荣 何志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宁 洪
责任校对	高琦华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宁 洪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8.25
插 页	18 页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56-1
总 定 价	16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林国荣	何志云		
编委成员	林国荣	何志云	朱海闵	张鸿雁
	张锦才	黄大同	黄杭娟	李人麟
	施王伟	黄明智	韩 磊	支 涛
	陈子达	彭云波	季琳琳	史长虹
	沈 恒	马向东	王 涛	蒋中崎
	高琦华			

总 序

何志云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终于面世了。

它的面世，既是学院从中专到高职五十余年教学与科研的结晶，所谓水到渠成，也是学院迈入高等院校之列后，教学与研究水平努力进入新层次的标志。

作为高职院校，都以培养高等应用性人才为目标；但是由于艺术和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它对高等艺术职业教育技能型又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教学、创作、研究有机结合、有机渗透。

无论从艺术本体还是从艺术教学的角度，艺术教育中“艺术”的实践性、参与性与操作性，决定了离不开具体的艺术作品；而艺术教育中学科知识的学习必当围绕着支持、帮助对艺术作品的学习、理解和深刻把握而展开；另一方面，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由此看来，艺术教育中的研究，影响并决定着艺术教育的特色与深度，是艺术教育高等性的重要体现。与综合性大学的重在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起来，高职艺术院校的研究，更偏重于实践型、应用型的理论探索，要对教育教学实际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院提倡“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创作为两翼，全面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学术与教学相长，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互促进。教师的研究意识逐步加强，对艺术教育教学规律性的认识也逐步加深，能紧密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特别是能从艺术教育特色出发，紧紧围绕教学开展创作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如浙江青年实验艺术团（学院直属）排演的原创音乐剧《五姑娘》参加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荣获第十一届“文华大奖”，并入围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我院学生在全省、全国性的比赛中，如全国第七届“桃李杯”舞蹈大赛和“蚁力神杯”全国戏曲戏剧大赛、全国越剧演唱比赛、声乐比赛、央视青年歌手大赛、全国模特大赛中屡获大奖；我院数位教师获得文化部教科司“区永熙音乐教育奖”和浙江省教授“名师奖”；同时，学术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果，学院曾承担国家“十五”重点艺术研究项目与省级艺术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各类学术专著五十余部。这里编辑出版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便是我院近年来教科研学术成果的一个新的展示。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虽以戏剧为主旨，却涉及到了艺术与艺术教育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其中有对浙江戏剧现状的研究，如对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浙江戏剧现象与发展的系统性的评述与研究（《感悟——徐沙戏剧论文选集》），有越剧教育教学实践的规律性总结与提炼（《开卷有缘——袁开祥艺苑耕耘录》），也有对艺术美学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美学论文集》），以及对浙江民歌与浙江地域文化的探索（《浙江民俗文化论稿》），更有立足于学科基础与大量史料上的史论著作，如《近代上海娱乐文化探微》与《中国演剧史》。其中不乏闪耀着理性之光的学术探索，如《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的缺憾一

二三》(落地,见《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教师优秀论文集》),对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戏曲研究,从概念范畴到研究分野再到学科规范进行剔爬梳理,提出尽早把中国民族戏剧体系整理、建立起来,把“中国(民族)戏剧研究”这门学科树立起来的观点,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厚重的理性思考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刊登,并为《新华文摘》等文集所收录,在学界引起反响。

当然,《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研究丛书》所收入的文集大部分还停留在应用层面与现象层面的研究,但它们毕竟都来自鲜活的教学实践与艺术实践,它们的出版对进一步提高我院教师的研究意识与研究水平,提升我院艺术教育教学质量,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文集的形式进行教学与学术研究总结,这在我院还是第一次。如果说,把今次出版的名之为第一辑,当陆续还会有第二辑、第三辑……

我们期待着!

2007-5-1

于钱塘西溪西底

目 录

总 序	何志云
第一章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形成背景	(1)
第一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物质基础	(1)
第二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气质依附	(9)
第三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其它条件	(16)
第二章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特点	(29)
第一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边缘化特点	(29)
第二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产业化特点	(42)
第三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移民化特点	(72)
第三章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发展状况	(89)
第一节 娱乐业的经营巨头	(89)
第二节 娱乐种类的发展	(95)
第三节 娱乐文化的消费者	(138)
第四章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重要人事	(150)
第一节 大世界	(150)
第二节 霍氏跑马厅	(168)
第三节 “舞潮”案	(176)

第一章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形成背景

每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除在渊源上与其他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外，还与当地的社会群体分布和人文社会环境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某一个地区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群体，对该地区的文化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重要影响。具体就近代上海的情况而言，商人可以说是在社会中最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当时的上海也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一种商业社会。

第一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物质基础

早在十九世纪初，隶属于吴越文化圈的上海因通海之便的优越地理位置，继扬州（唐代）、杭州（宋代）、苏州（明代）之后，成为中国南北方沿海贸易的中心，重视商业是吴越大地的文化传统。商业发展本就较内陆要繁荣的多。周边城市的相对衰落，使上海成为最闪耀的明珠。与之相比，向来被称为“人间最为繁华之地”的苏州却经济衰退不可逆转，自清代嘉、道时期开始，苏州因运河航运的衰退、海运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丧失区域经济中心功能的趋势，杭州、南京等地也每况愈下。太平军战事以后，江南传统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更是一蹶不振，这成为江南区域经济形式变化最明显之处。相比之下，“沪北弹丸之地，而富朋繁华，甲十天下。”上海的繁荣更为凸显。

1843年的开埠和租界的建立，则直接把上海的商业贸易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使上海从局限于国内的埠际市场扩展到直接对外的国际贸易，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值

就从占全国不足 10%，一跃而为占全国的 50% 左右，取广州而代之为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马关条约》签署后，上海资本主义由单纯的商业化，进入工、商业化。各国在上海的工业投资猛增，被形容为“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同时，外资的斥入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 81.2% 的对外商贸，79.2% 的外国银行投资，67.1% 的工业投资，以及 76.8% 的房地产投资集中在上海。上海的职员总数、资本价值，占了中国金融业的四分之三。

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浓重的都市里，商人虽不能说是民国上海娱乐文化的创造者，甚至也不是娱乐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直接反映者与传播者，但他们却是娱乐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载体的创造者。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的上海没有出现以商人为轴心、以商业为支柱的新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导致上海人价值体系与文化观念的新变化，也不可能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娱乐文化。所以，上海商人虽不属于文化人的范畴，但却对娱乐文化的



耀武扬威的英军长枪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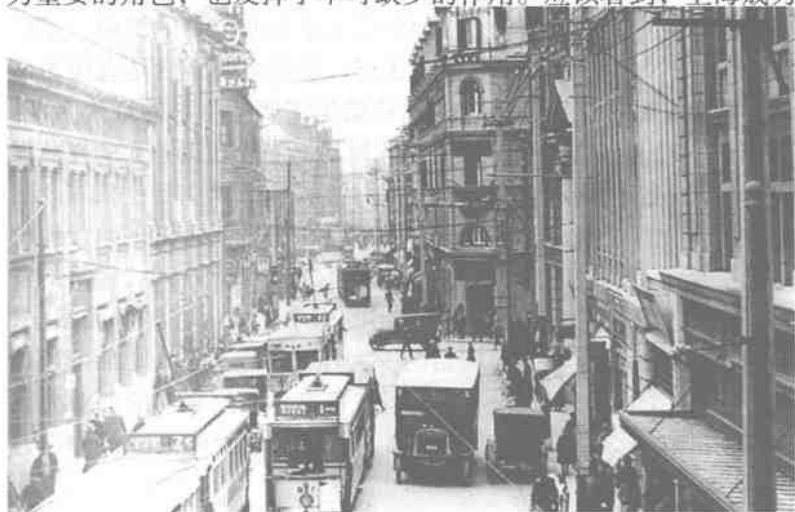
形成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商人在上海社会中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及重要影响，首先是因为开埠之后上海的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由一个普通县城跃居成为全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进出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和商业、金融业空前发达，如果说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上海才初步形成商贸与工业并重的经济格局，那么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上海的经济则主要是以商业贸易占主导地位。与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相比较，上海的近代工业在开埠后启动十分缓慢，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才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业。当时上海与现在的香港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其经济实力主要不是体现在生产领域，而是流通领域，具体说也就是体现于进出口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巨大吞吐量，同时还体现于适应商业贸易发展需要而形成的雄厚金融势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金融中心地位。上海最初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也主要是在一些服务于商业贸易的行之中。1909 年上海有 82 家工业企业，其中纺织、丝厂即占 47 家，船厂 8 家，皮革厂 3 家。这些企业显然是直接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业，以及为适应航运需要所创办的近代企业。可见，当时上海的工业仍从属商业贸易，未能获得独立的充分发展。近代上海的崛起，更不像其他一些城市那样主要是依靠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崛起的。事实表明，鸦片战争前后上海的政治地位并无明显改变，甚至可以说基本保持不变。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是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根本动力。在经济因素中，商业贸易又是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连西方人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①其次，商业贸易不仅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中占有

^①（美）霍塞 著 越裔 译，《出卖上海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191 页

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是推动上海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和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主要因素。这也使得上海商人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所有近代化城市才具备的先进设施，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均已不再是梦想，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现实设施。但这些先进设施，政府当局都未拨款出力，而是由上海商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办起来的。比如成立于1905年的近代上海最早的民间市政管理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是以商人为主体的所组成。在改变旧上海县城落后面貌，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等方面，总工程局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商业贸易不仅是近代上海的经济支柱，而且是推动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商人在上海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应该看到，上海成为



外滩海关。旧上海商业化的坐标

全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固然有其天然地理因素与外商云集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也离不开上海商人苦心经营和辛勤劳作。因此，是商业奠定了民国时期发展上海经济、建立上海大众文化的物质基础。

上海商人在社会上享有重要地位与显著影响的第三个原因，是其成员为数众多，经济实力非常雄厚。近代上海商业贸易的高度发展，使上海的商号与日俱增，商人在市民中所占比例，较诸其他城市也高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租界内的商号 1865 年有 88 家，到 1906 年增至 3677 家。如将华界包括在内，1908 年上海已有商号 7381 家，1909 年又增至 10528 家。^① 这个数字虽然较为具体，但并不十分精确，估计还有许多小商铺未计算在内。另据 1935 年的调查，上海公共租界中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为：工业人口占 18.28%，商业人口占 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人口占 0.95%，1946 年对上海 290 万就业人口的一项统计表明，从事商业的人口多达 57 万，占 19.76%。在位于商业中心的黄浦区和老闸区，从商人数的比例更高达 45% 和 44%。^②

从上述情况看，近代上海商人的人数较诸其他城市显然更多一些。但是，商人在整个上海的人口毕竟还未占到大多数，这一点又与其他城市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相似。不过，商人在上海不仅是最富有的阶层，而且也是社会影响最大的阶层。在上海，社会名流大多出自于商界大亨。上海的富商大贾腰缠万贯，呼风唤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如同当时的上海报刊《申报》1896 年 3 月 9 日的文章所说：“夫租界一商场也，治理之权皆在商人，……故租界之中每定一法，行

①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32 页。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的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5 页。

一令，必须得多数商人之许可，而后乃可施行焉。”晚清时期曾两度出任上海道台这一最高地方行政长官职务的吴健彰，也是一位出身洋行买办的官僚。另外，上海开埠之后，西方国家在早期任命的驻沪领事，有许多也是由洋行的大商人兼任。例如美国、法国、瑞典、挪威、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国的驻沪领事，都具有领事兼商人的双重身份，以至于有些记载将上海开埠初期称为“商人领事时代”。

由于近代上海商业贸易的高度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显赫以及社会影响的日趋广泛，使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的整个上海社会都打下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以商人为主角的商业化社会，生活在这种商业化社会环境下的上海人，即使并未经商，也时时刻刻受到商业气息的熏陶。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势必会出现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然是朝着适应商业化社会的趋向发展。于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某种商业化的色彩，又进一步使得整个上海的文化发展变异，由此产生一种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新型文化，民国时期上海的大众娱乐文化受其影响也不足为奇。

娱乐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也是受近代上海商业化的影响。作为市民文化范畴的娱乐文化，与精英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它是以市民大众为主要对象，将文化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市民的消费领域。在许多方面以迎合市民的需要为主旨，其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商业化倾向。

相应的，民国上海的经济发展，已经使上海滩的大亨们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也拥有了在上海的话语权利——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话语权利。我们可以通过发生在 1920 到 1922 年的上海民间“禁彩运动”认识这一点。

赌博作为一种运气大于智慧、技巧和体能的博弈性游戏，是

一种非常好的资金筹集方式，对于发行者来说，它不需要还本付息。当可成为政府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再分配手段，世界上除伊斯兰教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发行彩票，甚至成为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产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彩票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我国出现于晚清时期。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湖北签捐票”，实际是中国官方直接经营的第一种奖券，主要用于支付庚子巨额赔款。此后，浙、皖、鲁、湘等省相继发行了各省奖券。随后，各种以“善后”、“救灾”、“慈善”为名的奖券在我国屡见不鲜，上自中央政府、地方团体，下至贩夫走卒、贫民百姓，投身其中。我国的博彩业开始初具规模。

对于彩票购买者而言，彩票是一种隐性赌博，其赌性隐匿于博彩人对于微乎其微的中大彩概率的期盼中。是人们的投机热情促成了彩票业的勃兴，但真正的受益者只有彩票活动的组织者。而且如果博彩运作管理不严，发行过滥，在社会上就会起不良反映，“一般国家都要限制它。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在经济拮据时发行过彩票，但随即应看到彩票的不良社会影响，而进行过‘禁彩’运动”。^①

1920年7月，华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荒。内务部鉴于此前发行奖券筹款的先例，呈请开办奖券，中央政府则困于中央财政的窘迫，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呈请，于是全国性彩票开始发行。奖券发行后，各省区原办奖券非但没有停发，而且请发行者愈来愈多。这一方面表明，经营奖券盈余丰厚，各省督军决不肯轻易放弃到手的银子；既然政府带头发行奖券，中央政府就没有理由拒绝同样以救济名义请求发行奖券的各省督军的“善行义举”。彩票发行的宗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由于发行机制不健

① 闵杰：《论清末彩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全、政府监控力度不够等原因，在奖券的发行过程中出现了摇奖舞弊、侵吞贪污、余资使用透明度低的现象。彩票的过度泛滥已经严重侵害了工商界的自身利益，所以此次禁彩运动由工商界人士积极倡导，上海各界踊跃参加。首先发难的，是上海闸北新民路居民张敬澄，他于1920年8月11日写信《商界总联合会请禁彩票》给淞沪警厅厅长，请其转详上海督军和江苏省省长，“因见国内彩票种类繁多，而受彩票毒者皆中下层平民，”故呼吁政府“一律禁止，以遏赌风”。这一呼声很快得到众声回应，12日，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1920年8月27日刊发该函，并配发评论性文章。8月27日，商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临时大会，对禁止各种彩票一案进行表决。议决结果一致同意致函北京政府国务院，要求“取消成案，通令各省，一律禁止发行”彩票。此后，沪西商界联合会展开多种积极的活动，“他们先后两次向江苏省议会请愿，恳求代为主张，咨请军民各长官勒令各奖券店铺一律停闭，以为根本上之铲除，同时直接致电北京政府内务总长，要求‘即日令各地长官，将各奖券严行禁止’为造成禁绝彩票的强大舆论声势，他们还请愿苏报会，通告外省各团体，联合起来，一致禁赌”^①。到1922年4月1日，商界联合会再次具呈北京政府内务部，要求“查案将部中准许发行之各种奖券，先行限期截止，通咨各省一律停办，以后永远禁止发行”。5月，上海各工团执行委员会也先后致电江苏省议会、上海护军使、交涉使，要求禁绝彩票。他们还就法租界开放奖券营业一案向法驻沪领事交涉。7月19日，贵州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逢吉里事务所召开议会常务会，议决结果“所有彩票无论用何

^① 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77页。

名义，均应永远禁绝”^①。于是，在上海各界声势浩荡的要求禁绝彩票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政府再也不能漠视它的存在。1922年8月10日内务部呈国务院函文曰：“窃查各省区前因筹款办理慈善事项，请办奖券，本部当以事关救济，分别核准发行，原系一时权宜之计。兹各团体请将奖券限期停止等请来，本部复加察核。本定有期数，拟定各省区照期实行停止，不得再行续办，未即开办者，嗣后无论因何事项，一律不得开办，稗可克期停止，以资结束”次日，务院即卜批示“准如所拟，即由该部通行遵照；接着，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也于同年9月2日卜令禁绝一切彩票。至此，禁彩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运动中，工商界人士的表现最为活跃，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列，吴娜、周迎春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禁彩运动的反思与启示》中说：“他们成为了运动的倡导者和坚强后盾。他们借助报纸传媒制造舆论压力和利用函电和请愿的现代合法手段向当局施加影响，颇富成效。”可以说，是金融工商业的力量使得政府下令禁彩的。而且政府虽下令禁绝彩票，在上海，农商部所办的农商实业券并不在禁绝范围内，仍然堂而皇之地在市面发行运作，可以说，政府在上海的权利实施是有限的，所以本次禁彩运动少有彻底性和实效性，发行不发行，禁止不禁止，还得上海滩的大亨们说了算。工商界力量在这次民间与政府的对抗运动中的充分发挥，也使我们充分体会到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工商业的发展对该地区整个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近现代上海娱乐文化的气质依附

民国时期上海地域文化的形成，是洋泾邦与五方杂俎浇灌下

^① 《商界联合会请厉禁彩票》，《民国日报》，1922年7月21日。